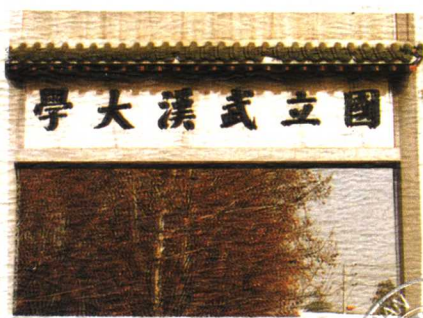


中华学府随笔

走近 武大



主编 龙泉明 徐正榜

四川人民出版社

44.628
659=2

中华学府



01010323538Q 郑州大学图书馆

走近
武大



主编 龙泉明 徐正榜

四川人民出版社

Qay 4/105

责任编辑:周 颖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何 华

中华学府随笔·走近武大

主编 龙泉明 徐正榜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64 千

2000 年元月第 1 版 2000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768-1/G·941 印数:1—5000

定价:10.00 元



序：走近武大

龙泉明

我入武汉大学已有十五年了，好像对它的底细还不甚明白。现在四川人民出版社要我编一本关于武汉大学的书，我虽然乐意地接受了，但心里感到并不轻松。出于一种兴趣，我开始了对武大的了解，对武大的解读。

武大曾经有着非常骄人的履历。我入武大读研究生时，它就过了七十诞辰。在一九九三年，一下又跨到了一百诞辰。原来它把历史追溯至它的前身张之洞在一八九三年所创办的自强学堂，于是它就成了全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百年历史之辉煌，百年校庆之隆重，着实让兄弟院校羡慕。好像也有人不承认它为百年老校。其实从自强学堂到国立武汉大学，它处于从小至大、从弱至强，并初步形成综合性大学格局的一个连续的发展阶段，把它纳入武大的历史是说得过去的，并非有什么离谱。

武大走过了一个世纪，已经走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它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大学发展的缩影。中国的历史造就了武大，武大的历史镌刻着中国的历史风云。中国的每一次历史巨变，都在武大产生过强烈的回应，例如，拒俄运动、武昌首义、五



四、五卅、一二九、抗日民主、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等，都在武大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邓颖超、罗荣桓、郭沫若、李达、李汉俊、恽代英、伍修权、郭述申等革命先辈都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同时，武大还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了大批杰出人才，他们中不少人为革命立过战功，洒过鲜血。

作为一所高等学府，武大一直注重的是优良学风的养成、崇高学术地位的铸定和优秀人才的造就。蔡锡勇、张渲、石瑛、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邬保良、李达、刘道玉、齐民友、陶德麟、侯杰昌等知名人士先后在这里担任过校长。辜鸿铭、华衡芳、许德珩、李四光、孙大雨、黄侃、朱光潜、竺可桢、汤佩松、查谦、桂质廷、叶雅各、闻一多、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刘骥、刘永济、朱东润、杨端六、李剑农、邓初民、曾昭抡等众多蜚声中外的著名专家学者曾在这里执教。他们为武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八九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创办了一所近代高等学府——自强学堂，一九〇二年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它们为武大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一九一三年方言学堂改名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九月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一九二四年又改为国立武昌大学。一九二六年十月武昌大学与国立商科大学、国立医科大学及省立文科大学、法科大学和私立中华大学、北京中俄大学合并成为国立武昌大学。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校址设在武昌东湖之滨的珞珈山。一九三八年迁校四川乐山。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复员珞珈山。

张之洞之所以创办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是因为他看到了教育与民族振兴自强的密切关系。他说：“盖闻经国以自强为



本。自强以储才为先”。“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在中国今日,学堂尤为自强要端。”他还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日多,国势日盛”,“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育才要旨,自宜多设学堂”。他还将此写进自撰的《学堂歌》:“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可以说,自强学堂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创办、自己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张之洞规定自强学堂的培养目标不是简单地做翻译,而是要培养出“能自读西书,自研西法”,能“察临国之政、能殊方之学”的“经世致用”“通才”。清末民初,湖北派遣至东西洋的文武留学生多出自湖北自强学堂和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同全国大多数留学生一样,一方面忍辱负重,一方面发愤学习。他们接触了西方的文明后,对比清朝的腐败,逐渐萌发了革命的思想,许多人成为辛亥革命运动的先驱者。正如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就说过的:“为维护封建制度所锻炼出来的各种武器,倒过来反对封建制度。”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说得更为风趣:“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到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是武大由专科性质大学逐渐向综合性质大学发展的阶段。时任武昌高师校长张渲,颇有作为,他热心办教育,十分注意校风学风的建设。他为武昌高师题写的校训是“朴诚勇”。武昌高师的校歌为:“乾坤清旷,师儒道光,国家建武昌。镜湖枕麓,屏城衬江,灵秀萃诸方。东西南朔,多士踰阡,教学宜相彰。朴诚有勇,陶铸一堂,学盛国斯强。”这校训、校歌激励着莘莘学子去不断拼搏奋斗,至今有许多老学长尚能一字不漏地诵唱出来。在五四运动中,武昌高师的青年学生不顾反动



政府的压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反动政府制造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武昌东厂口“六一惨案”。武昌高师学生不畏强暴，继续坚持斗争，直到“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来武昌师范大学校长张继煦、武昌大学校长石瑛，都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努力，做出了成效。

一九二八年，武昌中山大学改组为国立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李四光为委员长的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选校址于东湖之滨、珞珈山上。新校舍的建筑“以宏伟坚固适用为原则，不求华美”，整个建筑讲究整体布局，在建筑风格上采取中西之所长，溶古典建筑艺术与现代艺术为一炉，开创了我国现代建筑史上的新风。新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屹立在中国的中部，成为中国学府重镇之一。初创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具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十五个系，二个研究所的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时任校长王世杰说，武汉大学应当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他上任之初就提出“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大学”。他表示：“留校一天，当努力尽自己的力量，决不敷衍苟且，空占其位置。”王世杰校长在学校建设上表现出相当的雄心和魄力。在办学思想上，他认为“大学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学术，一在促进高深学术”，因此他主张聘请教授必须严格，“宁缺勿滥”，并且强调“教授治校”。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训练”，他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地位”。他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个人品性修养上，同着全校教职员，尊重全校的纪律，造成良好的学风。”由于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武汉大学得到迅速发展。三十年代初，一位来华旅游的美



国外交官问胡适博士：“中国究竟进步没有？”胡适回答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王世杰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但他只以创办武汉大学为荣。一九八一年他在台北病逝，墓碑上刻的是：“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继王世杰之后，著名化学家王星拱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倡导学术民主和思想解放，主张造成一种良好的学术研究和育人环境，使武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一九二八年到抗战前夕，武汉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基本的格局。

一九三八年初，武汉已成为被日寇三面包围的孤岛。在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武大暂时迁校于四川乐山，直至抗战胜利。在乐山时期，武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并扩大了招生规模，也因地制宜开展过一些科研活动，使武大各个方面都有所进展。时任校长的王星拱，对学校的建设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主张。他主张学校的教育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要适应世界上进步的大环境，不要适应国内落后的小环境。他认为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的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都是在数十年之后，所以办教育要有深邃的眼光。他主张学校要养成“研究实学”的风气，即是在教学和科研中，摆正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他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他还说，各国大学制度不同，有的侧重于知识的创造和联续，有的还要并重人格的培养，我们的学校是采取第二个原则的。为此，要在学校中进行人格教育，大学师生倘若精神萎靡，事业做不成，学问也求不得。他特别强调战争



和困难时期的人格教育，他说，他们素来负着介绍近代科学的人们，在平常时期，要注重物质的创造和补充，但是在非常时期，要注重精神的锻炼和警惕，这是我们师生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王校长的办学主张在武大的历史上起到过一些积极的作用，八年抗战时期，武大之所以能在艰苦岁月里维持下来并有所发展，和王星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复员武昌珞珈山后的武汉大学开始调整和充实学校机构，扩大学校规模，并增设了医学院。国立武汉大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创建之初刻于武昌街道口大学牌坊上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所体现的武汉大学的办学规模与格局，到这时完全实现了。时任武大校长为著名国际法学家、教育家周鲠生先生，他长期执教于武大并主持校政，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和不凡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武大应进一步扩大其规模，提高其质量，担负起建设一等大学的责任。为了充实武大的教师队伍，他礼贤下士，亲自到美国哈佛大学等地聘请了一批年青学者到校任教。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刘淦源、谭崇台、吴纪先、李崇淮、余炽昌等教授都是应周鲠生的邀请先后到校任教的，他们后来均成为知名学者。他在教育思想上提倡注重基础理论，注重文理沟通，同时要增强教学效能，充实学术文化，加入新的人才。他强调要“造人”与“出品”相结合，“造人”就是造就人才，“出品”就是拿出学术成果。他指出学校要造成研究的空气，高等学校应成为学术中心，“要使学校一切避免衙门的习气，维持学术的尊严”。他的办学思想对武大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武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并在世界上具有了一定的影响。一九四八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武大的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



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复员后的武大师生继续发扬革命斗争传统，在“反美抗暴”、“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反动军警制造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六一”惨案中，武大三名学生惨遭杀害，数十名学生受伤和被捕。这激起了全校师生和武汉市人民的公愤，愤怒的火焰燃遍了全中国。从二十年代以来，武大一直都有党组织存在，解放前夕，武大党组织发展党员近九十人，成为武汉地区党员最多、民主势力最强大的革命堡垒，被人们誉为武汉的“小解放区”。

武汉解放后，武大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旧的教育制度逐步被改变，新的教育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一九五三年，经过院系调整后，武大成为一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体的综合性大学。这次调整照搬苏联作法，强调专业教育，否定“通才”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国家经济建设急需专业人才的需要，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这次院系调整，把武大工、农、医等学科分割出去，使武大办学规模削弱了，整体办学水平受到影响。从那时起，武大一直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齐一步伐，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从五十年代至“文革”前夕，尽管“拔白旗”、“反右”等极左思潮和各种运动给武大造成极大的损失，但武大仍然注重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注重科研水平的提高，注重人才的培养，在全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时任武大校长李达先生，特别注意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广开才路，到处延揽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努力扩大师资力量，提高师资水平。他敢于抵制各种错误倾向，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使武大赢得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机遇，使武大的办学规模和水平都有了迅速的提高。



“文革”十年，武大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李达校长和一批德高望重的教授被迫害致死，教师的业务和学生的学习被荒芜，人才大量流失，武大元气大伤。

一九七八年以后，为武大重振旗鼓的时期。二十年来，武大解放思想，不断推进各项改革，重视和培养人才，加强学科和师资队伍的建设，着力于恢复和发展武大各方面的优势，各个学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学校发展成为具有文、法、理、工、经、管等门类优势学科和一些新兴学科的综合性的大学。武大领导和师生乘改革开放的东风，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以及研究生中期分流制和遴选导师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武大率先创办中法数学试验班和人文科学试验班，成为国家基础学科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武大是国家首批批准成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现有博士点五十五个，硕士点一百零六个，基本覆盖了学校所有学科，研究生的培养已经成为学校工作的重点，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已经达到一比三左右。科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学校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效益大大超过以前。尽管其间也有一些失误，遭遇过一些挫折，错过一些机遇，但从总体上看，武大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特别出现过八十年代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教育改革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较大成效的鼎盛时期。时任武大校长的刘道玉也因改革的成就而蜚声海内外。

位于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拥有校园面积三千一百多亩。它围抱珞珈山，三面环水，地势蜿蜒起伏，错落有致，气势壮阔。它有樱花、梅花、桂花、桃花，一年四季花香溢人。它有雪松、



梧桐、红枫、白桦，一年四季，绿树成荫，满目青翠。它的建筑依山而立，集西方古典形式与中国民族形式于一体，中西结合，相得益彰；校舍亭台楼阁，飞檐彩绘，美丽绝伦。它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幽深和雅致。说它是花园式的校园，当之无愧；说它是中国最美丽的校园，并不为过。武大的美丽，闻名遐迩，引来无数人观赏，特别是樱花盛开的时候，赏花的人群络绎不绝，形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它所拥有的这一切，构成了优良的育人环境。“在这里经过的朋友，常常羡慕我们的环境，说珞珈山的风景这样的清幽，建筑这样的宏丽，真是理想的读书的地方。”（陈源《读书与环境》）无数学子为在这里学习过、生活过、工作过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许多来武大参观过的人，在啧啧赞叹它的美丽的同时，更称羡它的优良的学术、文化环境。武大素以沉稳持重的学术、文化氛围著称。一些来过武大的人深有感触地说，“一看武大校园，就觉得有王者之气；这里肯定是藏龙卧虎之地，这里肯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确，在漫漫百余个春秋中，武大曾有过它的困顿，更有过它的辉煌。它以其综合性大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的特色，以其德、才、学、识并重的培养目标，以其生于忧患、成就人格、兢兢业业、扎实厚重、学问与人品一致的办学精神，为社会培养了数万名各类专门人才。它曾创造了一流的学派，出现了一流的学者，推出了一流的学术成果。经过历代学人的苦心经营，几乎每个学科都形成了深厚的传统，每个学科都人才辈出，每个学科都有坚实的根柢。这一切，构成了它那深厚的教育传统、学术传统和人文传统。

不过，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既是一种财富，又是一种包袱。作为一种财富，它对学校的发展能够提供有利的基础和



条件,后来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寻求发展的积极因素,获取有益的经验;作为一种包袱,它对学校的变革往往起着阻碍的作用,它往往束缚着人们解放的手脚。所以,对于学校的历史与传统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例如武大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重基础、重发展的人才培养观和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注重学术的思想,即把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提到首位,把大学定位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强调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大学教师应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也应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一个学校要立住脚跟,须以学术为基础。同时,教育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学术风气的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开展,而各种专门人才,也只有有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才能如沐春风,迅速成长。这一传统的办学思想,应当是武大继续前进的一种动力。在武大的历史上名师荟萃,英才汇集,出现了无数成就卓著、声名远播的优秀学者,他们以亲身实践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勇于追求真理的品格。他们为学术,为真理,而不为稻粱谋,不屈服于不正当的压力,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委屈,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种优良的学风和品格,应当为新武大人所承继和发扬。像李四光那样在学术上提出新理论、为祖国建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像闻一多那样开一代风气、敢于为真理献身的人文科学家,应当成为新武大人所崇尚的楷模。并且优秀的前辈学者大都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建树,他们不但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也大都出过国,留过学,接受过西洋文化的熏陶,可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像辜鸿鸣、华衡芳、许德珩、李四光、竺可桢、王星拱、邬保良、叶峤、查谦、桂质廷、戴春洲、梁百先、王治梁、曾昭安、汤澡真、肖君绛、吴大任、李国平、张远达、叶雅各、邵逸周、邓初民、曾昭抡、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燕树



棠、张珽、钟心煊、何定杰、汤佩松、高尚荫、石声汉、孙祥钟、余先觉、杨端六、刘秉麟、戴铭巽、温嗣芳、周新民、刘涤源、张培刚、赵师梅、黄侃、陈源、孙大雨、朱光潜、闻一多、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吴宓、刘赓、刘永济、朱东润、游国恩、高亨、苏雪林、黄焯、程千帆、李剑农、谭戒甫、方壮猷、吴其昌、钱穆、唐长孺、吴于廑、李达、熊十力、方东美、洪谦、万卓恒、程乃颐、张颐、戴镗龄、胡稼胎、范寿康、黄方刚、黄子通、高翰、陈修斋、袁昌英、潘耀泉等这样的著名学者，今天好象不多了，所以我们至今对他们怀有深深的崇敬和依念。今天不少有成就者，其学问都局限于比较狭窄的领域和范围，而不像优秀的前辈学者那样博大精深，虽然是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这种今不如昔的现象，但如果不努力改变它，武大就很难有大的发展和突破，就很难跻身于世界名牌大学之林。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武大的有些传统已经变得陈腐了，我们对它应当弃之不惜；有些传统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们应当改变它。例如武大有一个著名的传统：讲功底。作为教师，有了深厚的功底，教学质量就高，学问就扎实；作为学生，有了扎实的功底，就为他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调打功底，无疑是搞好教育的重要之点。正因为强调这一点，就形成了武大沉稳持重的学风。但是这一传统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效应。因为强调打功底，老前辈就规定五十岁以前应当潜心读书，打好基础，而不能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所以不少前辈学者至死没有著书立说，有的前辈学者的著作是在其死后由后学为其整理出版的；甚至有不少前辈学者学养深厚，学富五车，但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自己的东西。这种传统不知压抑了多少人的创造力。过去前辈还认为年轻人不成熟，发表著述会贻误子弟。其实，一



个人什么时候成熟是很难确证的。一般来讲,一个人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是精力和创造力最活跃最旺盛的时期,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季节,是很难有所成就的,所谓大器晚成者毕竟是少数。不少学者在年轻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成为他一生再也难以逾越的高峰。况且,学者的学术思想都有一个不断深化、逐渐成熟的过程,其学术成就都有一个不断积累和沉淀的过程,所以在学术上投入的时日越长,投入的精力越多,其成就则越大。并且,这种传统偏离了“知”与“行”相统一的轨道,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时都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社会的迅速变化需要我们研究者有一种紧迫感,如果要等到五十岁后才写文章,可能好多人已经写不出来了,即使写出来了,可能也有些老气横秋了,因为他已经过了创造的旺盛时期。所以,这种陈腐的传统观念在后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可以认为,对于历史与传统,要分析、要鉴别。对于好的要继承,不好的要抛弃;即使对于好的,也要继承而不能依赖,要发扬而不能固守。如果一味固持历史与传统,抱残守缺,就不能开拓进取;如果完全抛弃历史与传统,就缺乏根基。所以,武大在其百年校庆的时候,提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八字校训,或许正包含了这样的深意。事实上,武大一代又一代学者,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的,武大的优良传统也是在不断的扬弃中生成的。“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既是武大的传统,也是武大的灵魂之所在。

在这风风雨雨的百余年里,武大既有过光荣,也有过耻辱;既有过美丽,也有过丑陋。在旧中国时代,武大有过保守的风气;建国以来,武大时有“左”的恶性膨胀,为此,它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武大人中不乏“老大”的毛病,这种人常常看不起别人,自己却关起门来称霸。武大人也不够团结,因此窝里斗不断,匿名



信常有。虽然这些不一定占有多大的比重，但它在某些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惊人之举”，却让人不可理解。如果我们不痛恨这些丑态，根治这些毛病，武大就不可能加大其前进的步伐，武大的形象就不可能站立得更加高大。

一百多年的峥嵘岁月，武大历史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往事重重，风情万种。历代武大人都曾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兴衰与荣辱的历史、成功的或是失败的事业、可爱的或是可恶的事物、幸福的或是痛苦的生活、激动的或是忧伤的感慨，美好的或是苦涩的情感之记忆，等等。如果能把这些都采集起来，无不构成武大人心中的历史——非常感性化的历史，非常形象化的历史，它是与教科书上的历史不一样的历史，或者说，它是充满诗性真实的历史。通过这些，人们能够得到对于武大的真切了解和认识。但历史资料留存下来的却非常有限，我们能够选取的也非常有限，——在这里收入的文章，大部分选自一些报刊杂志和校友会刊物，少部分是请人赶写的。非常遗憾的是，很多重要的文章因篇幅所限未能选入，还有很多重要的人和事没有见诸于文字、披露于文章。这里所收入的，都是按照编辑的原则和要求所选择的有一定文彩和可读性的文章，难免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如果今后能从多种角度编辑多种类型的介绍武大的书，就能弥补这种遗憾。本书这有限的篇章，或许只能为人们提供一个了解武大这所百年老校的一面小小的镜子或窗口，人们或许能够从中获得某种真谛，得到某种感悟、启示与遐想。若能如此，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写作本文时曾参考了吴贻谷主编的《武汉大学校史》等有关校史资料）

一九九九年三月于武大

目 录

序 (龙泉明) / 1

校长侧记

自强学堂的创办人张之洞 (刘双平) / 3

怀念王世杰校长 (刘闻群) / 11

刘道玉——永远的校长 (陈俊 张真宇) / 17

看似匆匆却从容
——记陶德麟校长 (陈志鸿) / 26

教授印象

竺可桢在武昌高师 (《竺可桢传》编写组) / 35

我们的教授 (卯卯等) / 39

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 (苏雪林) / 51